

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再造的路径机制研究

杨江华 王玉洁*

提要:尽管学界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女性劳动参与及其经济社会价值,但对数字下乡如何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基于某平台企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公益项目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职业再造”是数字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逻辑,具体体现为三种路径机制:一是职业空间再造催生“数字蓝领”,通过引入在地化、灵活性就业岗位,重构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有效激活留守女性长期被碎片化和隐形化的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源;二是职业技能再造培育“数字白领”,依托新兴数字就业岗位推动返乡青年女性的“再技能化”,突破传统体制内外的二元职业结构局限,为其构建基于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流动通道;三是职业认同再造形塑“数字新农人”身份,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价值认同,推动农民从固化的社会身份标签向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农民职业转变。本文结论为通过数字下乡推动女性劳动力职业发展、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数字下乡 乡村女性 职业再造 路径机制

一、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如何激活乡村女性的劳动力潜能,拓宽

* 杨江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王玉洁,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其职业发展路径,已成为破解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与性别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议题。尽管国家长期高度重视乡村女性发展问题,但受教育水平、家庭负担、职业选择等结构性因素制约(吴惠芳、饶静,2009;周春芳,2013;杨志海、陈芝芝,2024),广大乡村女性,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女性,仍普遍面临“缺岗位、少机会、无发展”的职业困境。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生产生活场景,深刻改变了传统劳动就业格局,催生出大量依托数字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就业司(2023)数据显示,以微信、抖音、快手、京东、淘宝、美团、饿了么等为代表的平台企业,2021年共创造约2.4亿个就业岗位,为当年约27%的适龄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报告还预测,到2030年,数字经济带动的就业人数将达4.49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女性正成为数字就业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数据显示:以蚂蚁客服为代表的在线云客服岗位中,女性占比高达72%;支付宝人工智能训练师中,62.3%为女性;村淘直播主播中,53%为女性(中国妇女网,2021)。这一趋势表明,乡村女性职业发展迎来了新契机,有望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生动力。

数字就业群体中乡村“她力量”的崛起,不仅为破解乡村女性职业困境提供了宝贵样本,也为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激活女性人力资本、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对象。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数字下乡的宏观经济社会效应(如产业升级、治理转型、生活改善),对中观层面的县域职业结构转型与微观层面的个体职业发展机制关注不足,尤其是对数字技术下沉与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具体而言: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将乡村女性视为被动接受帮扶的边缘弱势群体,缺乏对其作为能动主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机遇的关注,特别是在不同人力资本禀赋下,乡村女性在数字新业态中的多元职业化路径尚未得到深入揭示;另一方面,当前关于数字下乡赋能女性发展的理解多停留在技术工具论层面,主要聚焦岗位数量变化、就业机会增减等表层现象,缺乏对数字技术如何深度嵌入并重塑县域职业结构、如何激活个体职业化发展过程的深层机制分析。为此,本文从技术与职业互构关联视角切入,通过构建“职业再造”这一分析概念,以某平台企

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开展的数字就业公益项目为案例,深入探讨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机制。

二、数字下乡与乡村女性职业发展

(一) 职业困境:乡村女性职业参与与流动受阻

职业不仅关乎个体生计,更是实现社会流动与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然而,长期以来,乡村女性的职业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制约,面临着参与受限与流动受阻的现实困境。从人口结构特征与人力资本水平来看,当前我国乡村女性劳动力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老年留守妇女群体,她们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普遍偏低,主要从事家庭照料、农业劳动或就近短期务工等活动;另一部分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新生代乡村女性,具有中高等教育背景,多数具有城市求学、务工或创业经历,返乡后是乡村人才资源的重要支撑力量。尽管两类群体在人力资本禀赋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在中西部县域劳动力市场中,都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职业发展困境。

其一,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留守妇女大多面临“就业不充分”困境,主要体现为务农收益偏低、非农就业机会稀缺、经济自主性不强。长期以来,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观念影响,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跨城乡流动成本等因素制约(吴惠芳、饶静,2009;周春芳,2013),大量乡村女性在婚育阶段或因年龄健康等原因不得不留守乡村,成为家庭照料任务和小规模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叶敬忠,2018),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被严重压缩,在时间上呈碎片化状态(熊瑞祥、李辉文,2017)。由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本地非农就业机会有限,这部分乡村女性在农业劳动生产之余,只能从事低报酬、临时性岗位工作(方黎明、谢远涛,2013),有的甚至完全退出有薪劳动力市场。

其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生代乡村女性返乡后通常面临“就业质量不高”困境,主要体现为体制外优质岗位匮乏、职业选择面较窄、向上流动通道受阻。以90后、00后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乡村女性受教育水平较高,注

重职业发展与自我实现,大多不愿从事传统农业劳动(钟甫宁、陈奕山,2014;向晶、刘华,2018)。这部分学历优势青年返乡后普遍面临“体制内门槛高、体制外空间窄”的两难就业困境:一方面,体制内岗位仍是学历优势女性的首选,但近年来地方人事编制名额不断收紧,考公考编竞争愈发激烈(韩雷等,2016);另一方面,中西部大多数县域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就业吸纳能力有限,乡村高学历女性在当地通常难以找到匹配其人力资本回报的就业岗位,职业发展空间狭窄。此外,自主创业虽被视为一条替代性路径,但受资金、营商环境等因素限制,传统创业成功率较低,难以成为返乡青年的主流选择(魏滨辉等,2023)。

总之,对大多数中西部县域而言,受传统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单一产业结构的双重制约,无论是人力资本偏低的中老年留守妇女,还是具备学历优势的新生代返乡女性,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困境,即缺乏有效转化和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的渠道机制,致使其职业参与和发展流动受阻。一方面,中老年留守妇女长期从事家庭照料与低效农业劳动,其劳动价值被隐形化,本地非农就业市场难以匹配其碎片化的劳动供给;另一方面,具备较高教育背景的新生代返乡女性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构性错配,既面临体制内岗位的激烈竞争,又缺乏体制外的优质岗位选择。这一结构性矛盾使乡村女性人力资源存量无法有效盘活,其潜在的性别红利也难以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二)职业再造:数字下乡与乡村女性职业新变化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加速向县域乡村下沉,引发了地方产业结构与就业模式的深刻变革。有研究指出,数字下乡能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回流,促进乡村资源优化配置(陆益龙,2022)。特别是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为乡村女性提供了更多元的职业路径与发展机会。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

一方面,数字下乡通过产业数字化路径拓展了女性的就业选择入口。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融合推动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不仅拓展了农业产业链,还降低了乡村女性就业创业的门槛(辛宇等,2022)。尤其是“短视频+直播电商”的兴起,使乡村女性在创业中能更好发挥其在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方面

的性别优势(吴菲,2023)。相关研究还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政策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有重要作用,且对女性、中老年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潘嗣同等,2024)。此外,数字下乡为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殷浩栋等,2020),通过带动休闲农业、体验农业和民宿经济等新业态,为乡村女性创造了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吴惠芳、王宇霞,2020)。

另一方面,数字下乡通过数字产业化路径推动女性就业层次提升。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深入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将数据处理与售后服务业务外迁至中西部地区,催生了如人工智能训练师、云客服等新兴职业岗位(杨江华、王玉洁,2022)。这些新兴职业通常收入水平更高、职业发展前景更广阔,且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传统限制,在促进县域职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也为返乡女性提供了更灵活、多元的高质量职业选择(王玉香,2022;陈华帅、谢可琴,2023)。

尽管现有研究已关注到数字下乡对乡村女性就业产生的积极效应,但大多仍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的理论阐释,或局限于对岗位数量增减、就业形式变化等现象的静态描述,缺乏对就业形态转型与职业结构变迁之间深层机制的探讨。尤其是在当前以产业振兴带动人才振兴的国家政策导向下,数字技术如何深度嵌入县域职业结构、激活女性人力资本并转化为有效的人口红利,仍有待进一步的经验实证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引入“职业再造”这一分析概念,旨在突破静态的岗位变动分析框架,揭示数字下乡不仅是技术渗透或工具引入的过程,更是对乡村职业结构与性别分工体系的深层重构。所谓“职业再造”,是指在数字经济新业态驱动下,通过对乡村女性劳动力技能、知识与资源的重新组织与配置,推动就业形态转型与职业结构升级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乡村女性的传统职业角色,更重要的是拓展了她们在县域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与职业发展空间。因此,其关注的核心不再是“是否就业”的数量层面,而是职业类型、能力结构、身份认同乃至社会角色的结构性变迁。

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县域劳动力市场。正如亚当·斯密(1972)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劳动分工的深化依赖于

市场规模的扩展。数字经济的兴起正不断拓展新的市场边界,催生多样化的就业形态与职业路径。已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为草根阶层提供了自我展示与发声的平台,有助于逆转其边缘化趋势,促进社会流动和身份地位重塑(吕鹏、李蒙迪,2022)。还有学者指出,以外卖配送、快递物流、网络直播、在线客服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对传统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形成了虹吸效应,加速了农民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崔岩、黄永亮,2023)。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随着数字技术加速向农业农村渗透,返乡青年的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体力劳动或临时性服务岗位,择业范围也不再拘泥于县城体制内的“有编工作”,而是转向乡村网络主播、人工智能训练师、云客服等新兴数字职业。这些职业类型正在打破传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壁垒,为女性劳动者提供更多元、灵活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对于留守“宝妈”群体,本地就近就业不仅满足了她们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需求,也为盘活乡村闲置人力资源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新兴数字职业拓宽了体制外就业者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使具备较高人力资本的乡村青年女性能够自主构建职业发展轨迹,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再造”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体现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机制。它所指的并非简单的新就业岗位创造,而是在数字新业态驱动下,对乡村女性的劳动空间、职业技能与身份认同进行系统性重构,从而推动其职业化发展的社会过程。这一重构过程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城乡之间与性别之间的结构性壁垒,重塑了乡村女性在县域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为释放女性人口红利、汇聚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提供了一条关键路径。通过引入“职业再造”概念,本文试图将分析焦点由静态的就业结果转向动态的职业发展过程。为深入阐明其内在机理,下文将立足于此分析框架,从“空间—技能—认同”三个维度,逐一剖析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发展的实践机制。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某互联网平台企业(以下简称“A企业”)参

与的乡村振兴数字公益项目作为分析对象。A企业自2019年起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凭借其技术、资源与平台等优势,围绕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科技兴农与绿色生态等重点领域,持续探索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企业模式创新。特别是在乡村女性发展领域,A企业在政府部门引导下,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全国17个欠发达县域推动实施了“社区工厂”“数字木兰”“电商助农”等系列公益项目,致力于提升乡村女性的就业质量与职业发展能力。这些项目覆盖群体广泛、业态多元、持续周期长,为本文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样本。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自2021年开始对A企业的数字乡村公益项目进行定期追踪研究。主要数据资料收集于2023年6—8月以及2024年9月,其间课题组深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贵州等七省(自治区)的15个项目县域开展实地调研。课题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确保数据多元互证。定量研究方面,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基础数据,共回收有效问卷1636份。问卷数据主要用于描绘样本群体的基本人口特征、数字技能水平、职业经历及发展状况,为后续案例分析提供宏观背景支撑。定性研究方面,课题组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方法,累计完成150余人次的访谈。访谈对象涵盖项目就业基地员工与负责人、基层政府干部、公益机构负责人、女性创业带头人、留守妇女和返乡青年等不同类型的主体。访谈内容聚焦于乡村女性的职业选择动因、就业与创业经历、技能获取路径以及职业变迁带来的个体与家庭变化等核心议题。

四、职业空间再造:留守妇女的本地灵活就业

(一)职业在地化:重构留守妇女的非农就业空间

长期以来,中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经济活动空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路径依赖使她们的经济参与主要局限于低附加值的家庭农业经营;另一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在家庭照料中的角色定位。这种经济结构与社会观念的双重约

束,严重限制了留守妇女的非农就业机会,导致其人力资源长期被低估和闲置。近年来,国家“数字乡村”战略与“巾帼创业就业”等政策的持续实施,为破解留守妇女的职业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政策机遇。

以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为例,当地政府和 A 企业合作实施乡村振兴就业帮扶项目,采取“平台订单+在地用工”的运营模式,推动“互联网+”社区工厂等新业态落地。该项目聚焦假发、穿戴甲、刺绣等手工制作产业,为留守妇女提供就近就业机会。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平安区社区假发工厂累计吸纳乡村女性劳动力 200 余人,人均月收入增加近 1000 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A 企业通过支付宝“百县百品”助农专场活动,促成当地的青绣工坊和潮流知名服饰品牌牵手合作,借助“青绣+”和“+青绣”的文化创新理念,助力平安非遗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经过三年多的持续努力,平安区青绣数字化总部已吸引 140 家企业(工坊)入驻,集中培训工坊带头人 50 余人,培训绣娘 1500 余人,签订青绣订单产品 6 万余件,上架产品 420 余款,带动了包括周边地区在内约 15 万名留守绣娘实现季节性灵活就业。

如果说社区工厂是在地化的生产制造空间,那么数字下乡通过推动乡村服务业场景重构,则为留守女性开辟了从传统家务劳动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新赛道。针对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A 企业公益部门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指导下,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了“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项目。该项目的核心创新在于将乡村女性在日常家务劳动中积累的隐性知识与生活技巧,转化为现代民宿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服务技能,实现了从“无酬家务劳动”向“有酬专业服务”的价值重构。截至 2024 年底,“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项目已覆盖全国 16 个省份,累计培训学员超 6600 人,预计到 2025 年底将突破万人规模。该项目不仅有效拓展了留守妇女的新就业空间,助其实现稳定就近就业,有效回应了其兼顾家庭与工作的现实需求,还解决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形成了女性职业发展与地方文旅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无论是社区工厂工人、民宿管家,还是快递分拣员、电商物流打包员,这些岗位均体现了“数字蓝领”的职业特征,即以轻体力劳动为主,辅以数字工具操作,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包容性。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这种植根于

乡土生活圈的职业空间重构对留守妇女产生了三重赋能效应。其一,低技能门槛与工作灵活性增强了留守妇女的非农就业可及性。这类职业对技能要求不高,能较好适配当前乡村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本结构特征。问卷数据显示,在社区工厂就业群体中,女性占比 97.2%,已婚占比 94.4%,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69.4%。其二,相对稳定透明的薪酬机制提升了留守妇女的经济自主性。虽然这类岗位的月均收入集中在 1000—3000 元,整体低于外出务工水平,但与农业生产节奏相契合的弹性工作机制,使留守妇女能在家庭照料与有偿劳动间实现动态平衡,进而提升其经济自主性与家庭话语权。正如一位女工在访谈中所说:“以前没工作时,常和丈夫为钱吵架。现在我自己能挣钱了,买东西不用那么犹豫,感觉在家里的地位提高了,花钱更有底气。”(访谈编码:YSY220218W)其三,本地就业的空间邻近性推动了留守妇女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就近就业不仅改善了留守妇女的经济收入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社会交往模式。一位被访留守妇女表示:“我现在都不想歇着,歇着在家也是干一堆杂活。而且家里就我一个人,在这儿还有朋友能聊天说话,大家平时相互交流,偶尔出去聚一下。我觉得干这个活除了自己能挣钱花,主要是有了自己的圈子,心情也好了很多。”(访谈编码:YSY230114L)

(二)灵活用工:数字平台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想有效释放留守妇女的劳动潜能,仅有在地化岗位是不够的,还需构建与之匹配的包容性用工机制。已有研究指出,为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弹性和灵活的工作形式通常被视为维持女性就业并兼顾家庭照料的重要策略(杨菊华,2019)。然而,传统工业经济范式下固定时空的雇佣关系,往往与乡村女性的家庭照料需求相冲突,阻碍了其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借助数字技术对生产与管理模式的重构,数字下乡推动形成了以平台为核心的弹性用工机制,为留守妇女拓展了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在地化就业空间。

A 企业推行的社区工厂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该工厂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如速卖通)作为订单中介,实现了全球市场需求与本地劳动力资源的高效对接(图 1)。社区工厂的就业群体主要是本地留守妇女,企业通常采用以

人际信任与社区纽带为核心的弹性化管理模式,并辅以计件制工资结算机制,为留守妇女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使其更好地平衡家庭责任与工作需求。一位中年女工在访谈中表示:“我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比较自由,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干,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能多挣一份工资。”(访谈编码:ZSY20230825H)这种模式有效利用了留守妇女的碎片化时间,实现了因地制宜的劳动管理。其底层逻辑是,数字技术强大的连接能力促进了城乡资源优化配置,打破了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为留守妇女开辟了新的职业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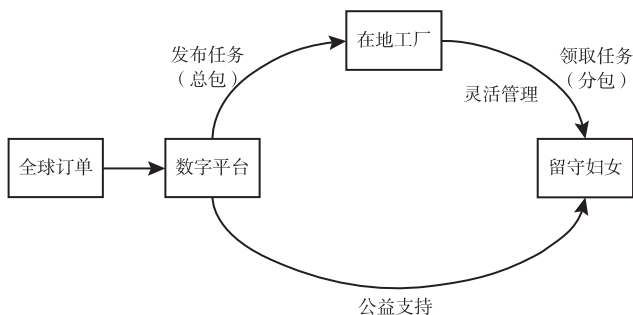


图1 “互联网+”社区工厂的运营模式

学界关于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普遍肯定了妇女劳动在维系中国小农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费孝通(2012)指出,在乡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不仅维持了不饥不寒的小农生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化带来的结构性危机;以女性为主的家庭手工业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发乡村经济失衡与社会结构脱节。黄宗智(2018)则强调,在半工半耕的传统社会经济形态中,小农家庭正是通过充分动员妇女与老人的辅助性劳动,才得以维系中国农村经济的过密化生存格局。李培林(2023)更进一步指出,将农村劳动力中闲置的时间资源转化为非农就业,是提升农民收入、激发乡村人口经济潜力的有效途径。

在中西部乡村空心化与留守化的大背景下,留守妇女已成为乡村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明德公益研究中心(2021)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有2.5亿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女性生活在乡镇地区,主要从事家庭照料或低回报农业劳动,非农就业率偏低,经济收入有限。因此,若能改变乡村留守

女性的非农就业方式,有效转化其闲置劳动时间,提升其劳动参与水平,就能释放这一庞大女性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本节案例显示,数字下乡推动的职业空间再造,通过“订单驱动、就近用工、弹性管理”的机制创新,成功地将数字经济的需求与留守妇女碎片化的劳动供给相匹配。这不仅满足了她们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现实需求,更关键的是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将闲置劳动时间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有效途径,解决了非农参与机会不足与劳动价值转化能力弱的核心痛点。这种包容性的职业空间重构,激活了长期被低估的人力资源,为乡村可持续振兴注入了新的内生动力。

综上所述,职业空间再造的核心逻辑是,数字下乡通过时空维度的深层重构,有效激活了留守妇女的人力资源潜力。在空间维度上,打破了传统非农就业对特定物理空间的刚性依赖,将新兴工作岗位有机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圈内,突破了留守女性长期受困于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的就业边界;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提供与家庭生活节奏相兼容的灵活就业机会,将她们长期被隐形化和碎片化的闲置时间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正是基于这种时空重构的数字赋能逻辑,留守女性得以在家门口实现从传统家庭照护者向现代有酬劳动者的角色转换,其经济自主能力、家庭决策权和社会参与度随之增强。这一转变不仅释放了乡村女性长期被低估的人力资源潜力,更为推进性别平等、夯实乡村振兴的微观基础注入了新动力。

五、职业技能再造:返乡青年女性的数字就业

(一)县域数字职业兴起与青年女性高质量就业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经济结构以传统农业和制造加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且多集中于低端服务业或零售业(贺雪峰,2022)。在这种产业结构下,乡村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通常面临比男性更突出的就业劣势,这也制约了当地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能力。近年来,面对乡村振兴中人才引留难题,一些中西部区县积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承接沿海发达地区数字产业转移,探索以人

工智能训练师、在线云客服等数字新职业带动本地就业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

以 A 企业实施的“AI 豆计划”为例,该项目依托地方政府、在地公司与平台企业的协同合作,已在全国建立了 17 个数字就业基地,累计培训上岗超 7500 人,其中超三分之二的基地已成长为当地用工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从就业人群构成看,基地员工中农业户口占比 82.4%,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 71.2%,平均年龄 27.9 岁,女性员工占比 68.5%,有外出务工或求学经历的返乡青年占比 77%。这些数据表明,以“AI 豆计划”为代表的数字就业项目正成为吸引中高学历青年女性返乡就业的重要渠道。

数字职业之所以受返乡女性青睐,关键在于其技能要求和工作方式与新生代乡村女性劳动力特征高度契合,能有效发挥她们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例如,人工智能训练师通常要求应聘者具备基础电脑操作能力、熟悉常用办公软件,并具备一定的图文信息理解能力;在线云客服则更看重员工耐心细致、沟通服务与心理韧性等非认知能力。总体而言,相较于传统体力型岗位,这类数字职业更强调脑力劳动与情绪劳动,体现出对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协同要求,对青年女性更具适配性和包容性。正如一位企业负责人在访谈中指出的:“虽然我们云客服岗位招聘不限制性别,但很少有男性来做,因为大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工作更适合女性,而且我们也的确发现女性比男性做得更好、更有耐心、服务意识更强。”(访谈编码:YAF230629M)

这类岗位对脑力劳动和非认知技能要求较高,呈现出明显的“白领”特征,为返乡青年女性开辟了体制外职业发展通道。以“AI 豆计划”项目为例,全国 15 个就业基地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9 月,员工月均收入约 3000 元,显著高于当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图 2)。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近四分之一工作满两年的员工月平均收入超 4000 元,部分业务能力突出的员工月薪可达 6000 元以上。清涧县企业负责人在访谈中表示:“年轻人以前在县里只有两种职业选择,一是公务员,二是服务员。现在县里有了 AI 豆公司之后,很多年轻人就愿意回来,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县里除公务员、医生、教师外,工资收入最高的企业了。”(访谈编码:QAF230628Y)由此可见,这类岗位在县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不仅为返乡青年女性提供了新的职业选择,也推动地方就业结构向知识型、技能型方向转型。一名清涧基地的员工也分享

道：“我现在工作两年多了，一般平均每月工资能拿四五千块钱，最近几个月我加班较多，所以工资都在 6000 多块钱，最多的一个月快 9000 块钱。我觉得这在县里面算比较高的工资了，比我之前在西安一家影楼做后期制作时的工资还高。另外，福利方面，公司给我买了三险，还有节假日福利、生日福利等。”（访谈编码：QAY230628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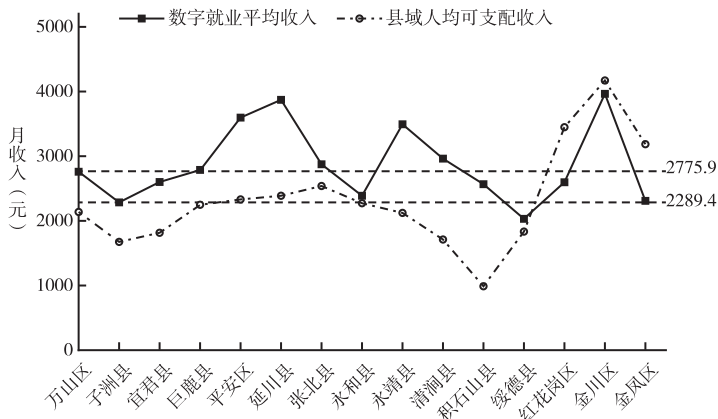


图 2 “AI 豆计划”项目基地员工平均收入与所在县域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

除经济回报的吸引力外，县域新兴数字职业在工作环境、管理模式和职业声望方面，共同塑造出了一种“体面”的职业形象。与传统工厂的嘈杂环境或服务业的琐碎劳动不同，数字就业基地通常提供现代化的办公环境、规范的管理制度、必要的福利保障及人性化的员工关怀，甚至为“宝妈”员工设有专门的亲子空间。甘肃积石山基地的一位员工在访谈中提道：“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因结婚成家便想回老家找份工作。原本担心回来找不到合适工作，没想到县里有 AI 豆公司，听说是给 AI 当‘老师’，就报名应聘了。干了半年多，我跟家人和朋友说我从事人工智能相关工作，他们听后觉得很‘高大上’。在这儿上班，和在正式机关单位差不多，环境好，有节假日，多劳多得，收入有保障。在我们县里，干这个工作挺体面的。”（访谈编码：JAY20230726G）问卷调查也显示，数字就业基地中计划长期（三年以上）在本地发展的员工比例达 50.2%。这表明，对许多中高学历的返乡青年女性而言，数字职业不仅是稳定的就业选择，更逐渐成为本地体面职业的代表之一。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1991:231)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信息社会看重脑力而不是体力,妇女跟信息社会真是天作之合……假如典型的产业工人是男性,那么典型的信息工人则属于女性。”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新的职业形态将不断涌现,新旧职业更替将会更频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价值定义和技能需求正在转变,对纯体力劳动的需求逐步减少,而对认知技能和情感劳动的需求则持续增长(余玲铮等,2021),这种转变为新生代乡村女性拓展职业选择、实现人力资本价值转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对县域而言,数字新业态发展能有效突破传统农业与低端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创造更多体制外的高质量就业机会,进而促进人才本地化留存与经济多元化发展。

(二)技能重塑:人力资本积累与返乡青年女性的职业化发展

数字下乡不仅重塑了县域产业形态,也深刻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结构。对具备一定教育背景的新生代乡村女性来说,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并非无门槛,而是伴随着对职业技能更新与能力适配的更高要求。这一变化引发了显著的“技能重塑”(reskilling)过程,即劳动者为适应新兴数字岗位的要求,通过系统培训和“干中学”等方式获取新技能、更新知识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个体的就业能力与发展空间,也在更宏观层面推动了县域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从职业内容角度看,数字新职业打破了县域传统岗位以体力与经验为主的劳动逻辑,更强调技术素养、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要求劳动者提升技能层次以适应全新工作岗位,体现了再技能化趋势。为适应职业技能新要求,从传统行业分离出来的乡村女性劳动力,需通过学习、接受培训等方式获得新技能,否则将面临被排斥在新就业岗位之外的风险。为此,“AI豆计划”数字就业基地需对员工进行岗前岗中培训,重点聚焦信息处理、线上沟通、平台操作、内容创作等关键数字技能领域,以使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更好地匹配岗位需求,从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助力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绥德县的一位员工表示:“我从幼师行业转到标注行业,来这儿除福利待遇好外,还有重要一点是我看好这边的发展。现在人工智能行业这么火,即便我将来不在这儿工

作,学习的技能也肯定有用。但幼师行业未来不好说,我之前在县里民办幼儿园干了三年,工资才2000多块钱,而且未来还有可能倒闭。”(访谈编码:SAY230704Y)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数字技能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与可迁移性,不仅能满足当前岗位技能要求,也为劳动者未来在更广泛的数字职业领域积累了新型人力资本。

从职业发展角度看,数字新职业凭借明确的晋升路径与公开透明的成长机制,为从业者积累人力资本、提升价值创造了良好条件。实地调研发现,目前数字就业基地的岗位类型,涵盖普通标注师、在线客服、质检员、组长、培训讲师,直至项目经理或部门经理,可分为三个主要层级:一是基层员工,主要包括普通标注师、在线客服、热线客服与投诉处理员等,是一线业务的主力;二是中层员工,由质检员、组长与培训讲师等构成,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还具备一定的团队组织与管理能力;三是高层员工,由项目或部门经理、副总经理等管理人员组成,负责企业的业务对接与组织管理等工作。这些不同的岗位层级,为员工提供了相对清晰的职业成长空间。问卷结果显示,员工的职位晋升与其入职年限呈显著正相关。入职满两年的员工中,中高层占比分别达52.9%与63.6%,体现出数字职业晋升机制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类岗位对初始技能要求相对宽松,但员工若想实现持续晋升与收入提升,仍需通过不断实践和系统培训以积累专业能力。例如,“AI豆计划”各基地员工平均每月至少参与两次业务技能提升或组织管理培训,部分中高层甚至被选派至其他基地担任讲师,形成了内部知识流动与人才再培养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多数乡村女性的职业发展路径局限于在低技能、不稳定的岗位间频繁切换,她们或是无酬的家庭主妇,或是在不同低技能岗位间流动的“打工妹”,难以积累有效的专业技能,更缺乏清晰的职业晋升阶梯。特别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受传统产业结构与不充分的体制外就业市场限制,中高学历人群在本地获得高质量就业与职业流动的机会极为有限。本节案例分析表明,在数字下乡过程中,新兴产业与新就业形态的引入,正成为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与职业路径多元化的重要力量。数字职业不仅契合了新生代乡村女性在本地体面就业的现实诉求,更通过持续积累数字技能和职

业经验,为其拓展了职业晋升路径与社会流动空间。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中关于数字化未能在乡村社会创造新的向上流动机会的观点不同。

既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虽为农村带来了新的产业形态,但这些新业态未为农村人口提供新的向上流动机会,原因是利用数字化发展新业态需要资金和技能,而这些资源往往掌握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手中(王春光,2023)。这一结论主要基于对农文旅等创业者群体的样本观察,偏重资本主导型的数字新业态,而忽视了数字产业转移背景下以技能积累为主导的数字新就业群体的出现。事实上,数字化能否促进农村阶层跃升,关键在于其能否重构职业结构,建立以技能成长与专业进阶为基础的职业发展机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体系是推动结构分化与流动的核心动力。如果数字化仅在引入新产业时停留于资本聚集与外包模式,未同步为劳动者创造职业发展空间,那么这类数字化实践势必背离技术赋能人的初衷。本文关注的数字标注师、云客服等新兴职业群体,呈现出以数字技能为核心的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特征。这类职业岗位在县域的落地发展,不仅重构了本地劳动力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体制内外的二元职业结构体系分割,为具备中高学历的返乡青年提供了进入县域社会中间阶层、实现就近城市化的可行路径。

六、职业认同再造:返乡创业新农人的自我价值实现

(一)身份转型:数字赋能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型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升级。然而,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农业经营收益微薄且社会声望低,导致乡村人才持续流失。特别是“农民”长期被视为一种固化的社会身份标签,而非具有吸引力的职业选项。破解乡村人才困境的关键在于推动“农民”角色的职业化转型,即从依赖土地的生计型劳动者转变为具备专业技能、市场意识和现代经营理念的发展型职业主体。这不仅需要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更亟须重塑与农业相关工作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认可度,以吸引有志于“三农”事业的返乡青年人才投身其中。

近年来,随着乡村电商与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一类融合农业生产与数字经营的新型主体——“数字新农人”不断涌现,且日益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值得关注的是,女性返乡创业者作为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农民职业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土地劳作,而是借助数字工具打通农业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环节,转型为兼具品牌意识与市场运作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进而重塑了“农民”身份的职业内涵与社会形象。

作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陕西省佛坪县当地政府携手 A 企业共建电商直播基地,实施“乡村数字人才陪跑计划”,构建电商人才“孵化—成长—出圈”的全过程培育路径,吸引了一批乡村女性返乡创业。以该县电商创业者周正亚为例,大学毕业后她针对当地食用菌市场痛点,开发了“羊肚菌汤包”这款特色产品,凭借直播平台迅速打开市场。随着线上销售规模的扩大,为保障产品质量与供应链稳定,周正亚筹建了集菌棒生产、菌菇加工与包装于一体的现代化车间。同时,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视觉设计专业特长,以秦岭大熊猫形象为核心元素,精心设计并推出“农小甄”品牌,带动了该县菌菇、山茱萸、天麻、魔芋等多种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实现了日均 3500 单的电商交易量。她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在本地建厂,一方面是为保证产品质量和供货量,另一方面是想带动本地产业发展,把产业链主体留在佛坪,让本地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访谈编码:FDC230316Z)

以周正亚为代表的返乡创业新农人在全国还有很多。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示,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创新创业人员近 1300 万人,形成了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和妇女四支创业队伍。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锋力量,返乡青年女性的创业实践除了体现在经济增收和产业发展方面,更重要的是她们实现了从传统“种田人”“外出务工者”“家庭妇女”等身份向从事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等领域的创业新农人的身份转型,重构了新时代的农民职业身份认同。陕西清涧的一位电商创业者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现在政府领导在公开场合都称呼我们为‘新农人’,我很喜欢这个称呼。我在短视频里也会以‘数字新农人’自居,让粉丝一看就能记住。我觉得这个‘新’字说明我们不再是过去的‘老农民’,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村致富带头人。”(访

谈编码:QDC230627Z)由此可见,返乡创业者从事的农业经营,已不再是对祖辈命运的被动延续,而是基于数字技能与市场意识的主动选择。

(二)认同重建:返乡创业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

职业认同是个体对自身职业角色的肯定性评价,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体现。传统农业回报率低,引发了农民的职业认同危机,这是乡村人才流失的深层原因。数字下乡为乡村青年女性重构职业认同带来了新机遇,尤其体现在数字创业领域。相较于传统的受雇型就业,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自雇型数字创业,自主性更强,收入潜力更高,发展空间更广阔。数字平台环境特别有利于女性发挥在沟通、社交互动和情感劳动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吴菲,2023),使她们能够突破线下传统行业普遍存在的性别壁垒与刻板印象,通过市场表现直接确认自我价值。

宜君县的杨婷曾是一名“打工妹”,在创业合伙人崔福的邀请下,加入了当地一家电商公司,开始摸索直播带货。经过不断学习摸索和直播历练,她从一开始不懂电脑的“电商小白”逐渐成长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直播一姐”,改变了当地村民对“女娃能干啥”的传统偏见。她在访谈中说道:“我从事直播创业前一直没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所以不停地换工作,也没赚到钱。回来做了一段时间直播后,我才发现原来‘能说会道’有这么大的用处。”(访谈编码:YDC20230719Y)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业团队成员中,杨婷既没有资金优势,也没有生产经营本领,但她凭借直播带货技能,以营销业绩在创业团队中脱颖而出。主要合伙人崔福也表示:“直播间购买农产品的主要群体是家庭妇女,所以女主播和她们沟通互动更有优势。杨婷能做我们几个做不了的事,是我们做电商的核心资本。”(访谈编码:YDC230719C)

新农人创业不仅为乡村女性自身带来了高质量就业机会,还通过一人创业带动多人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了她们对农民职业的认同感。例如,周正亚的电商创业不仅取得了个人成功,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经济增收与就近就业。截至2023年底,她的企业共带动76户108人从事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帮助农户年均增收6000元。此外,她所在的电商企业还雇佣了30余名员工从事包装、分拣等辅助性工作,其中多

数是当地中老年留守妇女。作为返乡大学生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周正亚的创业故事先后被《焦点访谈》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官方媒体报道,进一步强化了新农人作为乡村振兴先锋力量的社会形象,完成了对农民职业身份的积极重塑。

在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有限的市场规模和流通渠道致使农业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形成了黄宗智(2020)所描述的“内卷化”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服务小农户的新型“纵向一体化”流通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黄宗智,2018)。本节案例分析表明,数字下乡推动了乡村电商产业发展,网络平台成为连接乡村女性技能与市场需求的新机制。返乡创业女性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重塑了农产品流通模式和农业经营方式,有效突破了小农经济的发展瓶颈。在此过程中,以“数字新农人”为代表的职业认同再造得以实现:乡村女性不仅通过数字创业获得了经济成功,更通过施展技能、转变社会角色以及对地方发展做出贡献,实现了深层次的自我价值提升与社会认可。

七、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在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数字下乡正深刻重塑县域产业结构、就业形态与性别分工格局。乡村女性作为肩负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双重责任的关键群体,其人力资源的有效激活与价值转化,直接关乎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动力。本文尝试提出“职业再造”的理论分析概念,揭示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通过“空间—技能—认同”三重差异化路径,为不同人力资本禀赋和发展诉求的乡村女性群体提供适配的赋能机制(表1),有效回应了她们在职业发展中普遍面临的“缺岗位、少机会、无发展”等困境。

一是职业空间再造。通过数字技术在地化嵌入,为留守女性创造“数字蓝领”就业新空间。针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受家庭照料束缚的中老年留守

妇女,数字下乡引入“互联网+”社区工厂、民宿管家、电商物流等在地化、低门槛、弹性化岗位(“数字蓝领”),打破了传统非农就业对固定时空的刚性依赖。其核心价值在于,重构了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将就业机会嵌入乡村生活圈,有效激活了留守妇女长期被碎片化和隐形化的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源,显著发展了她们的非农就业参与度、经济自主性与社区社会网络,实现了对县域存量女性劳动力的有效动员与人口红利潜力的挖掘释放。

表 1 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再造的三重路径机制

职业再造的三重路径	核心赋能机制	代表性职业岗位	主要目标群体
职业空间再造	通过增加在地化、灵活性职业岗位,拓展低技能留守妇女的生计空间,提升其非农就业机会和社会自主性	“互联网+”社区工厂工人、快递分拣员、民宿管家等(“数字蓝领”)	中老年留守妇女
职业技能再造	通过引入新兴数字职业,培育、提升数字技能,助力返乡青年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与职业流动,实现体制外高质量就业	人工智能训练师、在线客服、数字人直播训练师等(“数字白领”)	返乡就业青年女性
职业认同再造	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角色转型与价值认同,实现创业带动就业的外溢效应,重塑新时代的农民职业形象	乡村电商创业者、直播带货达人、特色农业经营者等(“数字新农人”)	返乡创业青年女性

二是职业技能再造。借助数字经济新业态,助力返乡青年女性成长为“数字白领”职业群体。对于具有中高学历背景的新生代返乡青年女性而言,数字下乡带来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在线客服等新兴知识型、技能型岗位(“数字白领”)。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推动返乡女性实现再技能化,使其在数字就业中积累以数字技能、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等为核心的新型人力资本。新型人力资本的形成,在微观层面有助于破解她们返乡后面临的优质岗位稀缺困境,使其能够获得稳定、体面且有晋升空间的高质量职业。更为关键的是,在宏观层面,它打破了县域传统职业结构的天花板,为中高学历女性开辟了基

于能力成长的向上社会流动通道,为培育中等收入群体、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提供了内生性支撑。

三是职业认同再造。通过数字创业赋能重构农民职业价值,推动返乡精英女性转型为“数字新农人”。针对具备创业意愿与能力的返乡女性精英,数字下乡依托乡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显著降低了创业门槛并重构了农业价值链,支持她们转型为融合数字技能与现代经营理念的“数字新农人”。这一路径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农民”从固化的社会身份向具有吸引力的现代职业转型。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技能施展、社会角色转变以及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及其就业外溢效应),返乡创业女性不仅获得了深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也重塑了社会对“农民”职业的认同感与声望,成为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少数。

总体而言,职业再造的“空间—技能—认同”三重路径,分别从就业可及性、能力转化与身份建构等不同维度,揭示了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精准适配不同群体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家庭角色)与发展诉求(生计维持、体面就业、价值实现),对县域职业结构进行系统性的重组。职业再造不仅拓展了县域就业机会的“量”,更关键的是提升了职业发展的“质”(技能、认同、流动性)。这一过程有效弥合了产业发展与人口潜能间的断层,为破解乡村女性职业困境、释放性别红利、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提供了差异化且可持续的路径。

(二) 讨论

从上述结论可知,数字下乡赋能乡村女性,并非简单的技术引入或岗位移植过程,而是技术与职业深度耦合、协同互构的社会过程。本文借助“职业再造”这一核心概念,试图揭示数字技术下沉如何为乡村女性开辟多元职业路径,激活并释放其人力资本潜能,进而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的“她力量”。下面,我们将从数字下乡研究的理论视角转换、县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革以及性别发展主体性重估等维度,总结讨论本文在理论与经验层面的贡献创新,并反思其局限性与未来拓展的可能方向。

首先,本研究将数字赋能的研究焦点从技术设施的工具理性逻辑转向职

业结构重塑的社会过程逻辑,深化了对数字下乡赋能机制的理解。既有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多聚焦于基础设施(宽带、基站)、智能设备(农业物联网)或电商平台等硬件层面的下沉(曾亿武等,2021;陆益龙,2022),相对忽视了数字技术如何深度嵌入并重塑县域社会的职业结构与个体的职业化过程。本文提出的“职业再造”概念及其三重路径,揭示了数字下乡通过创造新职业空间、重塑新职业技能、重构新职业认同,为乡村女性将潜在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搭建了关键桥梁。这一发现突破了数字技术作为中性工具的传统理解,强调了其在县域职业结构重构和个体发展赋能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在欠发达县域激活微观主体(特别是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劳动力)、汇聚内生发展动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本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时代县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即数字新业态的出现正打破传统“体制内外”与“农与非农”的二元分割,催生出新的职业空间与社会流动渠道。以往研究通常将县域劳动力市场简化为“体制内”(稳定但稀缺)与“体制外/农业”(不稳定、低质量)的二元对立结构(贺雪峰,2022),或聚焦于农民工的城乡流动与职业分化(崔岩、黄永亮,2023)。本文发现,随着数字经济产业的梯度转移与本地化数字新业态的兴起,县域内部正在催生出一个以“数字蓝领”与“数字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职业阶层。这些新兴岗位打破了体制内外、农与非农的传统刚性职业边界。特别是职业技能再造路径,依托其技能偏向型特征,为具备一定学历基础的返乡青年女性提供了不依赖体制编制、基于能力积累实现职业发展与阶层跃升的可行路径。这一结论回应并修正了部分学者关于数字化未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流动的悲观论断(王春光,2023),指出以技能积累为核心、植根本地的新型数字就业,正成为重构县域职业阶层、促进本地化社会流动的重要引擎。

最后,本研究通过呈现乡村女性在职业再造中的多元实践,重估了其在乡村发展中的能动性与主体性价值,突破了传统“边缘/依赖”视角的局限。长期以来,乡村女性(尤其是留守妇女)在学术与政策话语中常被标签化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照料负担承担者”,其作为重要经济生产者和人力资本载体的潜力往往被严重低估(叶敬忠,2018)。本文研究表明,在适配的职业空间(空间再造)、有效的数字技能积累(技能再造)和积极的职业身份

认同(认同再造)支持下,乡村女性展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学习能力和创业活力。她们不仅是数字下乡的受益者,更是主动利用数字技术突破结构性束缚、实现职业化发展与价值创造的关键行动者。这一发现为既有研究所关注的乡村女性长期被压抑的人力资本潜能(杨菊华、卢瑞鹏,2021)提供了破局思路,强化了其作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能动主体地位。这一视角转换,对未来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应超越对乡村女性的“帮扶”思维惯性,真正将乡村女性纳入数字时代乡村振兴的主体范畴,构建性别敏感、能力导向、职业成长型的数字职业生态系统。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亟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其一,在理论层面,尽管“职业再造”概念揭示了数字下乡促进女性职业发展的三重路径机制,但对其中潜藏的不平等逻辑与结构性风险的关注仍显不足。三重路径对个体人力资本基础、家庭背景支持、地方产业发展政策等条件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约束,这可能加剧乡村女性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层与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机会分化”与“收益分层”的新现象。因此,未来研究可将职业再造置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性别不平等的批判性框架下,探讨平台用工模式对劳动权益保障、职业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影响,揭示数字赋能背后的复杂张力。其二,在经验层面,本文依赖政府—企业合作背景下的公益性项目案例,其赋能逻辑在缺乏政策扶持与市场稳定机制的背景下能否持续,还需长期跟踪与交叉案例对比。例如,本文提出的“职业认同再造”路径多依赖于个体精英的创业引领,如何将其典型经验转化为更具普惠性与可复制性的创业赋能机制,是今后研究和政策推动的一个关键方向。其三,在制度层面,当前社区工厂、数字就业基地、电商生态的持续运行仍面临诸如业务订单来源单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行业竞争内卷化等多重挑战,亟须更为系统与可持续的制度性支持机制,包括建立多层次培训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保障制度、优化平台规则等,以支撑县域数字职业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陈华帅、谢可琴,2023,《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劳动经济研究》第2期。
崔岩、黄永亮,2023,《就业技能与职业分化——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其社会后果》,《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方黎明、谢远涛,201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已婚男女非农就业》,《财经研究》第8期。
- 费孝通,2012,《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
- 韩雷等,2016,《“铁饭碗”可以代代相传吗?——中国体制内单位就业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动态》第8期。
- 贺雪峰,2022,《大城市的“脚”还是乡村的“脑”?——中西部县域经济与县城城镇化的逻辑》,《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
- 黄宗智,2018,《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开放时代》第3期。
- 黄宗智,2020,《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开放时代》第4期。
- 就业司,2023,《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我国平台企业创造就业约2.4亿》, 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302/t20230228_1350402.html。
- 李培林,2023,《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和路径选择》,《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吕鹏、李蒙迪,2022,《从“草根”到“网红”势差理论视角下社会流动现象审视》,《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陆益龙,2022,《“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2021,《农村女性经济赋能扫描研究报告》, <https://www.youcheng.org/upfile/20210507104335.pdf>。
- 奈斯比特,1991,《2000年世界发展十大趋势》,师晓霞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潘嗣同等,2024,《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就业效应与机制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斯密,1972,《国富论》,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春光,2023,《数字化时代农村新业态与社会分化机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王玉香,2022,《数字经济时代青年职业选择特征研究》,《人民论坛》第19期。
- 魏滨辉等,2023,《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 吴菲,2023,《返乡创业青年女性的短视频赋权与性别角色协商》,《中国青年研究》第8期。
- 吴惠芳、饶静,2009,《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吴惠芳、王宇霞,2020,《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妇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向“十四五”规划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向晶、刘华,2018,《人力资本提升与女性就业部门选择倾向》,《人口与经济》第3期。
- 辛宇等,2022,《数字技术力量下的乡村重构》,《地理科学进展》第7期。
- 熊瑞祥、李辉文,2017,《儿童照管、公共服务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期。
- 杨江华、王玉洁,2022,《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人文杂志》第4期。
- 杨菊华,2019,《生育支持与生育支持政策:基本意涵与未来取向》,《山东社会科学》第10期。
- 杨菊华、卢瑞鹏,2021,《性别红利:理论意涵、基本特征与社会效应》,《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

- 杨志海、陈芝芝,2024,《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人口与发展》第2期。
- 叶敬忠,2018,《留守女性的发展贡献与新时代成果共享》,《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 殷浩栋等,2020,《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改革》第12期。
- 余玲铮等,2021,《信息技术、性别红利与要素收入分配》,《学术月刊》第3期。
- 曾亿武等,2021,《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 中国妇女网,2021,《2021 中国农村女性就业调研报告:越来越多农村女性在家门口就业,超7成受访者表示家庭地位提高》, https://www.cnwomen.com.cn/2021/05/08/wap_99225638.html。
- 钟甫宁、陈奕山,2014,《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与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摩擦性失业”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周春芳,2013,《儿童看护、老人照料与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农业技术经济》第11期。

责任编辑:李天朗、蒲威东